

招生新政背景下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与纾解之道

郝 超, 沈潇湘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5日

摘 要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新政自2024年开始正式实施, 为高水平运动员学业管理工作带来深远影响。研究立足招生新政背景, 采用德尔菲法和决策实验室分析法(DEMATEL法), 通过对珠三角区域11所具有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的普通高校21名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 旨在揭示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 招生新政背景下, 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性, 专业设置、学籍管理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关键驱动因素。基于这些发现, 研究提出了“间接驱动”的纾解策略, 即通过专业特色培育和特色化课程体系建设激活运动员内在动机, 通过设置学分奖励上限、严格学分奖励范围端正运动员学习态度, 通过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提供全过程的学业支持激发运动员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应对, 引发连锁反应, 间接推动其他影响因素的改善。

关键词

高校高水平运动员, 学习投入, 影响因素, 纾解策略, 招生新政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Learning Investment of High Level Athlet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rollment Policy

Chao Hao, Xiaoxiang Shen

College of Sports Science,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ne 9, 2026; accepted: July 8,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文章引用: 郝超, 沈潇湘. 招生新政背景下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与纾解之道[J]. 体育科学进展, 2026, 14(4): 672-683. DOI: 10.12677/aps.2026.144093

Abstract

In 2024, the new enrollment policy of high level athlet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s formally implemented,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cademic management of high-level athlete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policy, and adopts the Delphi method and the decision laboratory analysis method (DEMATEL metho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1 managers of 11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high-level sports team recruitment qualificatio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t aims to reve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gree of influence of high-level athletes' learning inp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polic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level athletes' learning input present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al complexity, and major setting, student management and career education are the key driving factor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an "indirect drive" relief strategy, that is, to activate athletes' intrinsic motivation through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cultiv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to correct athletes' learning attitudes by setting a credit reward cap and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credit reward range, and to stimulate athlete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learning by strengthening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and providing academic support throughout the process. By responding to these factors, a chain reaction is triggered, which indirect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Keywords

High Level Athlet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earning Invest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Coping Strategies, New Enrollment Polic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竞技体育依然是实现体育强国的重要动力引擎。在此背景下,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作为体教融合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1],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和政策支持。文化学习作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简称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重要内容,是提升运动员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夯实其多元化就业、终身化发展知识和能力基础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培养存在重训练、轻教育现象,导致高水平运动员学业水平难以达到教育目标要求,个人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难以有效提高[2],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也制约了其未来多元发展的空间。进一步提升高水平运动员学业水平,是高水平运动员培养工作中一项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的任务。根据学习投入理论,学习投入作为学习者投入到有效学习活动的时间与精力,与学习效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投入有助于促进其学习效果的提升[3]。高水平运动员作为大学生中一个特殊群体,其学业水平亦受学习投入的影响。在以往“宽进宽出”的培养机制下,高水平运动员“训练首位,学习尔后”的认知和行为,造成其学习意识不足与思想松懈、缺乏学习动机与求知欲望、自主学习[4]。

针对高水平运动员培养中学训矛盾突出、部分运动员“学生”身份淡化且文化基础薄弱的情况,2021年9月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¹(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合理确定本校高水平运动队录取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同时对

¹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108/202109/t20210923_566097.html

招生高校的专业设置提出了新要求, 这些变化对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投入产生重要影响。经过三年过渡后, 招生新政于 2024 年全面实施, 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学习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但制约其学业水平的堵点和难点依然存在, 其中学习投入仍是一项关键的制约因素。因此, 准确识别和深入了解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现实掣肘, 是适应招生新政带来的变化、提高高水平运动员学业水平的逻辑前提和关键。目前, 尽管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研究在学训矛盾[5]、学习困境[6]、学业管理改革[7]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些研究也探索了招生新政带来的影响[8]。但总体而言, 现有研究往往未能深入融入我国“体教融合”深化改革和招生制度优化调整的具体政策语境, 这限制了研究结果在管理实践中的适用性, 反映出对情境化因素的考虑不足。

基于此, 本研究立足招生新政背景, 运用德尔菲法和 DEMATEL 法识别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 进而提出针对性的纾解策略。研究能够丰富国内关于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业管理的研究成果, 为招生新政实施后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业管理工作改革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业投入水平, 并最终为推动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培养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学理支持。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2.1. 问卷编制

为确保问卷内容的全面性、合理性与科学性, 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影响因素德尔菲专家评价问卷的编制遵循了严谨的多阶段流程:

(1) 初步条目池构建: 首先, 系统梳理国家及地方层面关于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招生、体教融合深化等方面的政策文件(初步筛选 7 份国家级政策文本, 包括《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²、《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³、《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⁴、《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管理的意见》⁵、《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试行)》⁶、《关于做好 2025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⁷、《关于做好 2026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⁸), 提取相关要求与导向。其次, 广泛回顾高水平运动员文化教育、学业管理、学习投入及学训矛盾缓解等领域的相关文献, 重点参考张春合、杨国庆、丁海勇、陶然成、张天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5] [6] [8]-[15], 从中归纳核心观点与常用测量维度。基于政策导向与理论基础, 同时结合小范围专家访谈结果, 围绕学校、文化课教师、教练员、运动员和社会家庭五个初步维度, 构建了包含 22 个具体影响因素描述的初始条目池。

(2) 条目筛选与优化: 为提升问卷的精炼度和测量效率, 结合体育教育领域专家的建议, 并合理借鉴朱佳慧等[16]的研究, 在预调查(N = 21)基础上, 采用“共线性诊断、区分度筛选、语义优化”相结合的方法对初始条目进行筛选。① 共线性检验: 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条目间的共线性问题。以 $VIF > 10$ 为判据, 识别并剔除了 2 个与其他条目信息重叠度较高的冗余条目, 分别是学校因素下的学业支持条目、教师因素下的教师关注程度条目。② 区分度筛选: 计算剩余条目的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CV 值越小, 表明该条目区分影响程度差异的能力越弱。以剩余条目 CV 值的算术平均数($CV = 0.24$)作为阈值, 剔除了 CV 值小于此均值的 5 个条目, 分别是学校因素下的奖惩约束制度、教师因素下的教学资源供给条目、教练员因素下的学习监督条目、运动员因素下的学习习惯条目、社会家庭因素下的同

²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9/202009/t20200922_489794.html

³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5_494794.html

⁴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108/202109/t20210923_566097.html

⁵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38/s3279/202202/t20220222_601205.html

⁶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8/content_7037222.htm

⁷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tslxzs/202411/t20241115_1163040.html

⁸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tslxzs/202510/t20251031_1418664.html

伴影响条目。③ 语义优化：对保留下来的条目进行仔细审查，对个别条目进行了微调，确保语言表述清晰、准确、易于理解。经过上述步骤，最终形成了包含 15 项影响要素的正式问卷(见表 1)。

Table 1. Desig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learning engagement of high-level athletes
表 1. 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影响因素的设计

维度	条目	编号	条目解释	文献来源
学校因素	招生管理	N1	依国家相关规定，按照相应招生权限实施招录运动员的工作	张春合等
	专业设置	N2	高校按照学科知识分类与社会职业分工对专业进行设置的过程	杨国庆等
	学籍管理	N3	依据教育部门相关规定，对正式录取的运动员从正式入学、专业学习直至毕业过程进行考核、记录、组织和处理的整个管理工作	丁海勇等
	激励机制	N4	对运动员学习行为进行激励的各种方法、手段、制度等的总称	陶然成等
	考核评价机制	N5	对运动员文化学习进行考核评价的过程、方式等的总称	张天峰等
教师因素	学习氛围	N6	影响运动学习行为、态度的整体情感和心理环境	杨兴权
	教学模式	N7	在一定教学思想/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各种教学活动基本结构	周星栋等
教练员因素	执教理念	N8	教练员在长期执教过程中不断思考及总结形成的思想和观念	张春合等
	训练比赛安排	N9	高水平运动员日常训练计划中具体训练、比赛内容的时间安排	张天峰等
运动员因素	文化基础	N10	高水平运动员在特定专业中已经具备的基本知识、技能和能力	陶然成等
	学习兴趣	N11	高水平运动员对某特定学科或领域学习和探索的兴趣	杨兴权
	学习动机	N12	引发与维持学生学习行为，并使之指向一定学业目标的动力倾向	杨兴权
	职业生涯规划	N13	个体根据自身情况确定的职业方向，并为此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	李成梁等
社会家庭因素	社会环境	N14	影响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活动的各种社会观念、社会认知等的总称	秦四齐等
	家长认知	N15	家长秉承竞技至上的理念，降低对子女文化学习方面的要求	张春合等

(3) 正式问卷编制：依据德尔菲法问卷设计的范式，针对最终确定的 15 个影响因素，设计结构式的题目，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每个题目均提供五个标准选项供选择：“① 非常重要”、“② 比较重要”、“③ 无所谓”、“④ 不太重要”、“⑤ 很不重要”，赋值 5 至 1 分。

2.2. 抽样与数据收集

2.2.1. 抽样区域与方法

根据德尔菲法选择和组建专家小组的要求(异质性小组，以 5~10 人为宜；同质性小组，以 15~30 人为宜[17])，本研究的专家是高水平运动队管理者，属同质性较高情况，所需最少专家数为 15 人。

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不同省份内部及不同区域间在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布局、项目分布、建设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9] [18]，为确保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深度，本研究在抽样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样本的代表性与调研支持度等因素，最终选取了高水平运动队和项目空间分布较集中、建设水平相对较高的珠三角作为研究区域，并聚焦区域内建有高水平运动队的普通高校。

抽样对象为负责高水平运动员日常管理，并满足以下条件的管理者：(1) 分管领域：高水平运动员教学、训练竞赛；(2) 管理经验：在分管领域从事相关管理工作不少于 5 年；(3) 职称水平：副教授(副处级)及以上。抽样方法采用滚雪球法。第一阶段，查询教育部文件，统计珠三角区域具有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的普通高校(共 11 所，其中 5 所 2024 年暂停招生)；第二阶段，在 2024 年广东省大学生田径锦标赛举办期间，在上述高校田径队总教练协助下，获取高水平运动队分管领导基本信息；第三阶段，在这些

分管领导中, 按照纳入标准经筛选符合纳入标准且知情同意后, 邀请其完成问卷调查。

2.2.2.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最终, 有 21 人同意加入本研究的专家组。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显示: 性别构成以男性为主(占 76.19%), 年龄结构以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为主(占 71.95%), 学历结构以硕士为主(占 85.71%), 职称结构以副教授为主(66.67%), 均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平均工作年限 15.29 年)。整体上看, 本次调查样本的年龄集中在 40 岁及以上, 学历水平和职称水平较高, 均有丰富的高水平运动队管理经验,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区域内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者的基本画像, 确保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采用匿名方式, 共进行 2 轮专家函询, 每轮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均为 100%, 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 0.856、0.874。通过统计各因素均分、变异系数和共识性差异, 并结合专家意见, 判断影响因素是否保留、删除或合并。采用 Kendall 协调系数(W 值)评估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决定是否可以终止函询。W 值介于 0~1 之间, 值越大表示专家意见协调程度越好。一般认为, 协调系数波动介于 0.400~0.500 之间时, 协调性较好。对 W 值进行 χ^2 检验, 按照泊松(R. Poisson) X^2 准则公式计算 X_R^2 值。计算自由度并查表, 若 $X_R^2 > \chi^2$ 说明专家意见协调程度较好, 结果可取, 反之结果不可取。结果显示, 经 2 轮专家函询后, Kendall 协调系数为 0.415, 且 χ^2 检验呈现出显著性($p = 0.000 < 0.05$), 说明专家意见基本趋于一致。

3. 结果与分析

3.1. 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影响因素的识别

本研究首先运用德尔菲法常用的评价指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依据专家($n = 21$)评价结果, 依据算术平均数($\bar{x}$) ≥ 4.0 分、变异系数(CV) < 0.25 的标准[19]筛选影响因素。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Delphi evaluation results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n = 21$)

表 2. 影响因素的德尔菲评价结果统计表($n = 21$)

	N1	N2	N3	N4	N5	N6	N7	N9	N10	N11	N12	N13
$\bar{x}$	4.38	4.48	4.57	4.52	4.48	4.33	4.38	4.43	4.62	4.29	4.57	4.57
CV	0.114	0.114	0.111	0.113	0.114	0.111	0.135	0.115	0.108	0.131	0.111	0.111

在第 1 轮专家函询中, 删除“执教理念”“社会环境”与“家长认知”3 项因素, 同时根据专家建议将“学习兴趣”修改为“专业志向”。据此, 编制成第 2 轮德尔菲专家评价问卷, 经本轮函询后各因素均符合纳入标准, 经检验发现专家意见趋于一致。如表 2 所示, 从影响因素的整体构成来看, 本次调查所涵盖的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影响因素主要分布在学校层面(5 项)和运动员层面(4 项), 教师层面和教练员层面的因素相对较少(分别有 2 项、1 项)。这表明, 对于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投入而言, 学校管理和运动员自身因素处于主导地位, 而教师层面与教练员层面的影响相对有限。

3.1.1. 学校层面的因素

招生新政背景下, 高校有关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管理(N1)、专业设置(N2)、学籍管理(N3)、激励机制(N4)及考核评价机制(N5), 都会影响运动员的学习投入。

在招生新政出台前, 高水平运动员修读的专业主要以高校指定的定向文科类专业为主, 只有少数高校允许高水平运动员自选专业, 如广东财经大学规定“被录取的高水平运动队考生可就读我校除艺术类外的所有普通类专业”。高水平运动员入校后由所在院(系)负责教学管理, 在学籍管理上多采取弹性学分制、推荐免试读研究生等措施, 进行单独编班教学, 训练及比赛成绩可获得相应的加分或学分, 将奖励

加分纳入文化课程成绩考核范畴, 允许学习成绩优异的高水平运动员免听、自学部分课程。受专业局限和课程设置制约, 不少高水平运动员所学与体育专业无关, 不利于他们在专项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招生新政对高水平运动员入校后就读的专业做了严格限制, 除符合相应分数要求外入校后只能修读体育学类专业, 要求高校在高水平运动员招生、专业设置方面做出调整和变化。因为在新政之前, 很多具有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资格的高校没有体育学类专业, 招生新政的出台使这部分高校必须在“取消高水平运动员招生”与“新开设体育学类专业”之间做出选择。为响应国家政策变化, 具有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资格的普通高校陆续申请开设体育学类专业, 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新增了体育教育专业。与此同时, 不少高校加大了对高水平运动员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或增加体育相关的特色课程, 或纳入学校的优势学科力量。例如, 北京理工大学将学校的光电学院、信息学院、宇航学院生物力学团队等学科力量纳入了高水平运动员专业课程体系, 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跨学科能力。

3.1.2. 教师层面的因素

从教师层面看, 课堂教学所营造的学习氛围(N6)和教学模式(N7)会影响运动员的学习投入。在招生新政出台前, 不少高校将高水平运动员单独编班, 进行统一管理、集中授课和因材施教, 因训练或比赛耽误的课时也便于统一补课。但单独编班时的学习氛围不浓, 学习效率不高, 学业成绩与双一流高校运动员差异巨大[20]。根据《指导意见》规定, 高水平运动员要想就读普通类专业, 高考文化课成绩应不低于招生高校相关专业在生源省份录取分数线下 20 分。文化课成绩要求的进一步提高, 从源头上提高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进入门槛, 有助于解决运动员文化基础薄弱的问题。招生新政的实施, 将使重训练、轻学习的思想逐渐得到纠正, 高水平运动员入校后的编班方式、教学模式等也将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高校新设体育学类专业, 意味着高水平运动员有更多机会进行专项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学习, 有助于促进他们的差异化发展, 逐渐形成与普通学生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提升其就业竞争力。这种变化对文化课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需要革新教学模式才能更好地支持和引导运动员的全面发展。

3.1.3. 教练员层面因素

从教练员层面看, 日常训练与比赛安排(N9)会影响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投入。受传统培养理念和思想意识等的影响, 不少教练员认为在运动员学习方面自己是“局外人”, 对运动员的学业学习重视程度不够, 与文化课教师沟通缺失。招生新政充分体现了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改革“严”的趋势、“高”的标准, 不仅是对高水平运动队设立初衷的回归, 更是对体育育人本质的回归[21]。这种改革要求教练员转变理念, 从“局外人”向“协同育人者”转变, 主动参与运动员的学业发展全过程, 在科学训练、不断提高运动员竞技水平的基础上, 帮助他们持续提升个人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当前,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多是运动员转型而来, 他们对运动员成长经历、学训矛盾有较深认识, 在处理学业与训练关系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他们不应该作为高水平运动员学业管理的“局外人”, 而应该成为运动员学业发展的引导者、帮助者、鼓励者。随着未来越来越多运动员进入体育学类专业, 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学训矛盾难题, 而教练员自身的成长经历和经验可以为其提供借鉴。在招生新政背景下, 教练员应积极参与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业管理, 帮助运动员少走弯路, 促进运动员成长为学业水平与竞技能力全面发展的综合人才。

3.1.4. 运动员自身因素

从运动员层面看, 其自身文化基础(N10)、专业志向(N11)、学习动机(N12)、职业生涯规划(N13)等都会影响到其学习投入。招生新政出台前, 高水平运动员入校时文化基础普遍较差, 完成文化课学习非常吃力。同时, 由于多数运动员入校后只能就读限定专业, 部分运动员专业志向偏低, 缺乏主动性与自觉性等。此外, 由于不少运动员缺乏职业生涯规划, 学习内驱力不足, 这些均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投入。招

生新政的最大变化之一, 在于大幅提高了高水平运动员进入高校的门槛。运动员要想进入好的学校并且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 其高考文化课成绩须达到与普通学生相同的水平。这种改革能够逐步扭转部分高校在高水平运动员选拔中“重竞技轻文化”倾向, 促使运动员重新认识文化学习的重要性, 引导他们在高中阶段更加重视文化课的学习, 合理安排学习与训练时间, 形成持续学习的内在动机, 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课成绩, 具备更扎实的文化基础和更高的综合素质。同时, 招生新政将专业选择权交给运动员, 只有达到新政中规定的文化课分数才可以选择普通类专业, 既能更好地满足运动员的专业志向, 亦能对他们在高中阶段的文化学习形成“倒逼”压力, 有助于强化其学习动机,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3.2. 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影响因素属性的分析

3.2.1. 影响因素的属性判定

为进一步量化不同影响要素对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影响程度, 本研究在德尔菲评价结果的基础上, 采用决策实验分析法(DEMATEL 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编制 DEMATEL 问卷, 邀请专家对不同因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进行打分。每个题目均提供四个标准选项供选择: “① 无任何影响”、“② 有较弱影响”、“③ 有明显影响”、“④ 有很强影响”, 赋值 0 至 3 分。通过比较不同影响因素(第 2 轮专家函询后剩余的 12 个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 可以识别出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影响因素的属性。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DEMATEL calculation results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n = 21)

表 3. 影响因素的 DEMATEL 计算结果统计表(n = 21)

	N1	N2	N3	N4	N5	N6	N7	N9	N10	N11	N12	N13
$D + R$	39.378	38.363	35.045	39.727	39.398	39.818	38.979	38.375	39.143	39.820	40.197	38.154
$D - R$	-0.296	2.334	3.990	-1.085	-0.651	-1.35	-0.315	-0.592	-0.921	-0.362	-1.306	0.555
属性	结果	原因	原因	结果	结果	结果	结果	结果	结果	结果	结果	原因

(1) 学习投入提升的关键因素(高 $D + R$ 值)。中心度($D + R$)是影响度和被影响度之和, 反映了因素在系统中的重要性程度。表 3 结果显示, $D + R$ 值排名前 5 的因素分别为“学习动机”(N12)、“专业志向”(N11)、“学习氛围”(N6)、“激励机制”(N4)以及“考核评价机制”(N5), 说明这些因素对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重要性较高。在这些因素中, “学习动机”和“专业志向”均是运动员自身因素, “学习氛围”属于教师因素, “激励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属于学校因素。这表明, 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多元性, 在今后的高水平运动员学业管理中, 既要着力于激发运动员学习的内在动力, 也要从学校和教师层面入手, 完善激励与考核机制,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2) 学习投入提升的驱动因素(高 $D - R$ 值)。原因度($D - R$)是影响度与原因度之差, 反映了该因素对系统中其它因素的影响。当 $D - R > 0$ 时, 说明该因素为原因因素(驱动因素), 会对其它因素产生影响; 当 $D - R < 0$ 时, 说明该因素为结果因素, 容易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表 3 显示, “专业设置”、“学籍管理”和“职业生涯规划”3 个因素为“原因因素”, 优化这些因素将引发系统内部的连锁反应, 从而有效提升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投入。其中, 专业设置会影响运动员的学习兴趣, 从而影响其学习动机和投入程度; 学籍管理作为运动员学习投入的制度性保障, 决定了他们在校期间学习的弹性与适应性; 职业生涯规划会影响运动员对未来发展的认知与期望, 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帮助运动员明确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使他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学习与未来职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而增强他们在学习上的投入。

从学习投入理论来看, 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投入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体的学习意愿, 而是在制度环境、学习情境和目标期待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持续性学习行为。其中, 专业设置通过提升专业适配性和学习获得感, 影响着运动员对学习任务价值的判断, 进而激发其学习兴趣和学习的动机; 学籍管理则通过

明确学业规范、学分要求和评价边界,为运动员持续投入学习提供制度约束。职业生涯规划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学习与未来发展之间的关联,使运动员能够将当前学习转化为职业竞争力提升的必要路径。由此可见,本研究识别出的驱动因素与学习投入理论中“情境支持-动机激发-行为投入”的逻辑链条具有内在一致性,也说明提升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应从外部制度供给和内部动机激发两个方面协同推进。

3.2.2. 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潜力

为更直观地展现不同影响要素对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综合影响潜力,本研究采用了 DEMATEL 分析中常用的中心度-原因度矩阵图。该方法以 $D-R$ 值(原因度值)为纵坐标,以 $D+R$ 值(中心度值)为横坐标,构建一个二维散点图。以 0 和所有 12 个要素 $D+R$ 值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作为纵、横轴的分割线,将整个坐标平面划分为四个象限,每个因素依据其对应的($D-R$ 值和 $D+R$ 值)坐标落入相应象限(图 1)。

(1) 中心度和原因度双高的核心因素(High $D+R$ & High $D-R$)。无因素位于第一象限,表明并不存在能够单独推动系统变化的决定性要素,要系统地应对这些因素才能改善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投入。

(2) 中心度低和原因度高的驱动因素(Low $D+R$ & High $D-R$)。专业设置、学籍管理和职业生涯规划 3 个因素位于第二象限,属“原因因素”,它们的优化能够带动系统的整体改善,如调整专业设置使其更符合运动员的专业志向,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优化学籍管理可以提高运动员的学业稳定性,减少因训练、比赛导致的学训矛盾;加强职业生涯教育能帮助运动员明确未来的职业定位与发展路径,增强其对文化学习的认同感和学习目标导向,从而激发内在学习动机,进一步提升其学习投入水平。

(3) 中心度和原因度均低的边缘因素(Low $D+R$ & Low $D-R$)。文化基础因素位于第三象限,反映出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投入受自身文化基础的影响较小,可能是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高校通过单独组织学生学习辅导或补课等措施,对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运动员进行了制度性补偿,使得文化基础这一先验条件的重要性被弱化,学习投入更多取决于运动员入校后自身的努力与学校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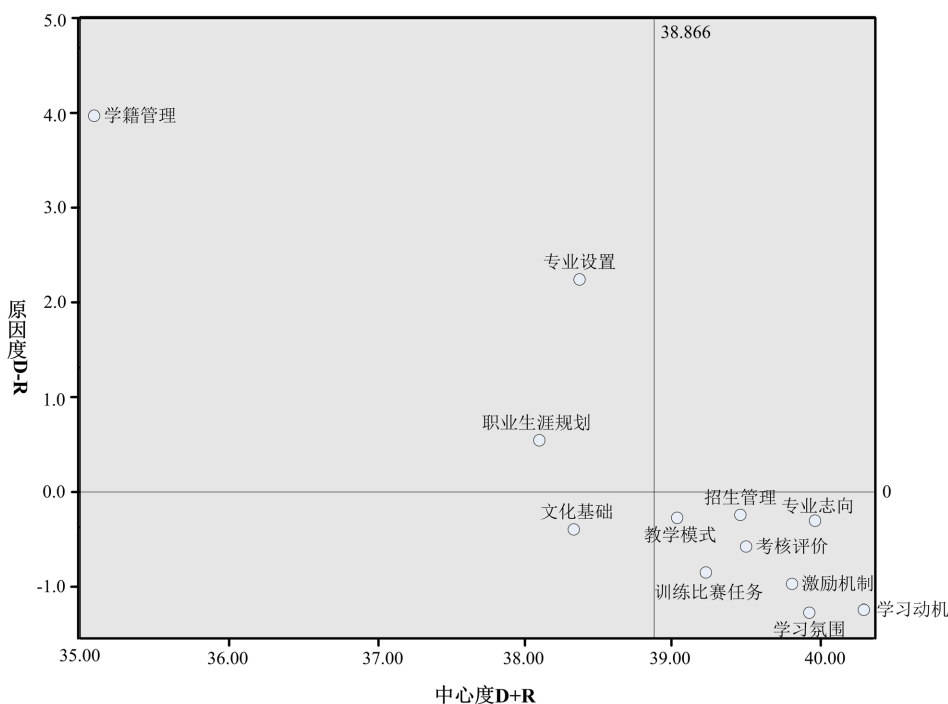


Figure 1. Centrality-causation diagra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earning input of high-level athletes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enrollment policy

图 1. 招生新政背景下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影响因素中心度-原因度图

(4) 中心度高和原因度低的基础因素(High $D + R$ & Low $D - R$)。教学模式、学习氛围、学习动机、专业志向、训练比赛任务、招生管理、激励机制与考核评价机制 8 个因素处于第四象限, 反映出这些因素主要受原因因素影响, 如学习动机本身受到激励机制、职业生涯规划、学习氛围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应对, 应围绕“如何调整其影响因素”展开, 而非简单地直接干预。

通过象限划分, 能使管理者“一目了然”地准确把握哪些因素最适合作为干预切入点, 哪些因素应作为结果监测对象, 有助于高校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进行更有效的学业管理改革和优化, 为相关纾解策略的探讨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依据。结合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潜力, 本文认为高水平运动员学业管理改革宜采用“间接驱动策略”, 通过对这些重点影响因素的应对, 间接推动其它学习投入影响因素的改善。

4. 招生新政背景下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纾解之道

4.1.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以特色培养激发学习内驱力

4.1.1. 推进体育类专业建设, 以差异化发展提升专业认同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⁹提出,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 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 这为高校体育类专业建设指明了方向。顺应高水平运动队招考模式改革趋势, 各相关高校应紧扣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目标, 以体育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 聚焦体育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准确把握体育类专业建设发展方向, 科学定位。立足服务国家和地方战略需求, 根据体育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依托自身优势学科专业和在高水平运动员培养中取得的累积优势来设置体育类专业, 积极培育学科专业特色。要充分发挥学校现有重点学科的作用, 整合学校的优势资源和学科交叉要素, 以跨学科交叉和多学科融合为载体, 促进体育学与医学、工学、经济学、法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融合, 在学科交叉创新实践中逐渐培育比较优势。通过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提高体育类专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社会认可度, 不断强化运动员的专业认同。

4.1.2. 建立特色化课程体系, 以课程获得感促进学习自觉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延伸和落脚点。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二三四 + N”主要任务, 并将课程建设纳入“N 建强核心要素”, 强调要迭代升级课程、教材、实践等核心要素内涵, 这为高校体育类专业课程建设提供了遵循。高校应以《高等学校体育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下文简称《国家标准》)作为课程建设的根本依据, 结合学校办学特色、专业特点及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 明确专业核心素养内容框架体系, 重新构建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 应以专业教育课程中的专业类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设计为重点, 根据学校学科优势将相关课程纳入“3 + X”专业核心课程, 构建有重点、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如广州体育学院在体育康养专业课程设置方面以“体医融合”理念为指导, 设置了康复功能评定学、运动治疗技术、中医养生康复技术、运动营养与膳食等课程。同时, 要紧跟国家政策导向, 根据近年来国家深化体教融合, 在大中小学校设立专兼职教练员岗位、推动优秀退役运动员进校园等政策, 研究设置教育类课程(教育学、教师资格证)、教练员课程(教练员与裁判员方向), 不断提高运动员的课程获得感, 唤起运动员学习的自觉性。

4.2. 加强学籍管理改革, 以严标准端正运动员的学习态度

4.2.1. 设置学分奖励上限, 以硬约束保证阶段性学业质量

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管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要“严格运

⁹<https://www.12371.cn/2024/07/21/ARTI1721551217863166.shtml>

动员学籍和学分管理”[1], 这为加强对训练和比赛奖励学分的管理提供了依据。高水平运动员在校期间同时兼顾体育和专业学习的双重任务, 实施训练和比赛奖励学分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 但应控制好学分奖励幅度。本文认为, 相关高校应加快完善高水平运动员运动专项学分管理制度, 细化运动训练和竞赛奖励学分的规定与标准, 综合考虑不同运动项目的特点、在校期间的参赛任务等因素, 合理设置学分奖励上限, 包括学年、学期的学分奖励上限以及学制总的学分奖励上限, 既能有效鼓励高水平运动员积极训练、竞争参赛, 又能通过硬约束最大限度地降低训练和比赛奖励学分对运动员学业质量的影响, 确保运动员保质保量地完成学年、学期的学业任务, 进而保证他们在规定修业年限内整体的学业质量。例如, 西华大学规定高水平运动员每学期的运动专项学分总量为 9 学分, 四年的学分总量为 72 学分,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则规定学年运动成绩奖励学分 12 分封顶, 这些探索为其他高校训练和比赛奖励学分改革提供了借鉴。

4.2.2. 严格学分奖励范围, 以严要求达到学业标准和要求

《通知》强调, “高水平运动队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学业水平要求原则上应保持一致”[1], 严格学分奖励范围能够确保高水平运动员按照与普通学生相同的毕业标准完成学业, 具有现实紧迫性。各相关高校在设置学分奖励范围时, 既要考虑到招生新政实施后高水平运动员文化基础有明显改善的现实状况, 又要重点考虑运动员运动技能水平高、专项实践经验丰富等特点, 结合《国家标准》的要求及专业课程体系的具体内容, 确定好学分奖励的范围。本文认为, 高校宜将训练和比赛奖励学分的范围限定在通识教育课程的公共选修课程和实践课程的社会实践课程等方面, 规定运动员在运动训练和参加重大比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学分(不超过学年、学期奖励学分上限), 奖励学分可以替代公共选修课、社会实践课等学分。但通识教育课程中的公共必修课、专业教育课程以及实践课程中的专业实践、科研训练等课程不允许用奖励学分替代, 因训练或比赛耽误考试的可申请延考, 但不能免考。通过严格要求能够端正运动员对专业课学习的态度, 促使他们在学业上投入更多努力以达到学业标准和要求。

4.3. 强化目标引领, 以职业生涯规划培养学习主观能动性

4.3.1. 聚焦全过程目标, 增强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2023 年 12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4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¹⁰, 将加强生涯教育列为推进构建高质量就业指导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强调“强化大学生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建设, 修订完善课程教学要求”, 这为高水平运动员职业规划教育提供了制度依据。高校应将职业发展教育贯穿融入高水平运动员培养全过程, 从大一年级起就开展职业发展教育, 确定每学期相应的学时和学分, 为运动员提供分阶段、精准化的职业发展指导, 帮助他们尽早树立起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深化对当前职业环境与就业形势的认知, 制定适宜的职业生涯规划。要着力构建科学、系统的职业发展教育课程体系, 结合专业特点设置针对性的课程内容, 以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为载体, 促进运动员职业能力与专业能力的协同发展。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帮助运动员了解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掌握相关规划的技巧和方法, 从而更好地规划职业发展。通过解决“去哪里”的方向性问题和“如何去”的方法性问题, 为运动员提供清晰的目标和方向, 使他们形成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心理预期, 充分激发他们投入专业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4.3.2. 聚焦精准化目标, 为运动员提供全过程的学业支持

高水平运动员在校期间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运动训练和比赛, 投入学业的精力和时间明显比普通学生少, 全过程的学业支持能够使运动员更容易达到与普通学生相同的学业水平。在国外, NCAA 高校为每一

¹⁰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s3265/202312/t20231205_1093196.html

名高水平运动员配备了学术顾问, 提供包括选课、时间管理、个性化学业规划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确保他们的学业进步; 在国内, 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内的高校均在试行本科生导师制, 全方位指导学生成长发展, 这为加强对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业支持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认为, 应加快推动学业导师制在高水平运动员培养中的推广, 通过配备学业导师为运动员提供精准化的学业支持。学业导师与运动员进行定期交流,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惑, 为他们提供专业引导、补课辅导、困惑指导、学业规划以及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专业支持。考虑到现阶段高校生师比较大, 可以考虑组建以一名优秀教师为主导, 以辅导员、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为补充的导师团队, 共同为运动员提供学业指导和支持, 帮助他们解决学业发展的疑难问题, 促进他们在学业上持续进步。

5. 结语

本研究将德尔菲法与决策实验分析法有机融合, 并应用于高水平运动员文化教育领域的研究, 构建了一个基于招生新政背景的学习投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框架。研究结果深化了对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影响因素重要性的理解, 为高水平运动员学业管理改革提供了微观的数据支持。本次研究发现, 招生新政背景下, 专业设置、学籍管理和职业生涯规划是影响高水平运动员学习投入的驱动因素, 提升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投入可采取“间接驱动策略”, 通过对驱动因素的应对, 间接推动其他影响因素的改善。故而, 从聚焦特色专业建设、加强学籍管理改革、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纾解策略, 即以特色专业激活运动员内在动机, 以严格的考核评价标准端正运动员学习态度, 以职业生涯规划培养学习主观能动性。通过上述改革提升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投入, 进一步提升其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项目名称: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民办高校体育学类专业特色培育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24YJC890044)。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管理的意见[EB/OL]. 2022-01-2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38/s3279/202202/t20220222_601205.html, 2024-01-26.
- [2] 李宁.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的本质要求与治理逻辑[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4, 47(8): 47-58, 104.
- [3] Kuh, G.D. (2003) What We're Learning about Student Engagement from NSSE: Benchmarks for Effective Educational Practices. *Change: 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 35, 24-32. <https://doi.org/10.1080/00091380309604090>
- [4] 尹碧昌, 欧汉镇, 杨珂. 学生与运动员: 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身份认同研究[J]. 体育科学, 2024, 44(3): 12-20.
- [5] 陶然成, 龚波, 何志林, 等. 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训矛盾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0, 33(10): 86-89.
- [6] 张春合, 袁娇, 蔡振强, 等. 学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学训矛盾中学习困境的三维解构与疏解策略[J]. 体育科学, 2025, 45(3): 34-42.
- [7] 沈潇湘, 陈静文. 体教融合背景下中美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业管理比较研究[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4, 44(1): 81-90.
- [8] 张春合, 张逸歌, 张辰琛, 等. 招生新政对学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影响及优化策略[J]. 中国体育科技, 2024, 60(9): 93-97.
- [9] 杨国庆. 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 历史考察、经验凝练与优化策略[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 45(7): 33-46.
- [10] 丁海勇, 韩冬, 邵斌, 等. 我国高等院校高水平运动员“学训矛盾”现状及对策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7(3): 374-376.
- [11] 张天峰, 李国. 普通高校“体教结合”模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与仿真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6, 31(1): 24-29.

-
- [12] 杨兴权. 影响我国部分体育学院高水平运动员学训矛盾的因素与对策[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8, 32(6): 85-88.
- [13] 周星栋, 肖丹丹, 张瑛秋. 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中的学训矛盾及对策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8(5): 62-67.
- [14] 李成梁, 周志帅, 甘荔桔, 等.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自我管理及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0, 43(11): 74-90.
- [15] 秦四齐, 夏思永, 肖存峰. 我国优秀运动员文化素质资本获得的困境与出路[J]. 体育学刊, 2007(4): 111-113.
- [16] 朱佳慧, 于丽英. 我国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耦合协同测度——基于 VIF-变异系数的筛选[J]. 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27(4): 785-794.
- [17] 王攀峰. 教科书研究方法论[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9: 246-247.
- [18] 赵建峰, 张殷波, 李建英. 基于多尺度的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空间分布和均衡性分析[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8, 33(3): 191-196.
- [19] 王春枝, 斯琴. 德尔菲法中的数据统计处理方法及其应用研究[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综合版), 2011, 9(4): 97-101.
- [20] 张霞. CUBA 东北赛区高水平运动员课业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9.
- [21] 高鹏. 激活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新动能[N]. 光明日报, 2021-12-19(13).